

流離時代的尋光者—— 台灣女革命者謝雪紅的真理之旅 (1901-1970)



林瓊華



【學歷】

法國國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與人文研究所博士



【經歷】

台北縣政府縣長室秘書

台北縣社區大學籌備處專員、台北縣板橋社區大學行政專員與講師

新台灣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研究計畫」兼任研究員

東吳大學法學院通識課程「文學與政治」講師

法國國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與人文研究所博士

法國諾曼第台法文化協會創會人兼副會長



【著作】

La quête de la vérité d' une révolutionnaire taiwanaise—Xie Xuehong
(1901-1970)

(2011, 博士學位論文)

流亡、民主與自治——陳芳明著作《謝雪紅評傳》的貢獻與爭議

(2010, 台灣風物六月號)

【授課大綱】

影片播放：公視《世紀女性，台灣第一》、〈台灣第一位女革命者謝雪紅〉，
導演：蔡秀女

一，引言：

「謝！你在 1928 年回台後，就經常說：『人生應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程。』」（楊克煌，1971.12.07. 北京）

- (1) 時代背景
- (2) 革命動機

二，謝雪紅在殖民年代的政治行動所牽涉的三個概念主軸

- (1) 階級
- (2) 性別
- (3) 國族認同

三，中國共產黨有關台灣民族獨立的觀點及其變化

四，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台灣人經驗

五，結語：謝雪紅留給台灣的精神遺產

【參考書目】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2004)：楊翠華自費出版。

楊克煌，《我的回憶》。台北(2005)：楊翠華自費出版。

林瓊華，〈女革命者謝雪紅的「真理之旅」(1901-1970)〉，收入《20 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2003)：國史館。

林瓊華，〈流亡、自治與民主：試論陳芳明著作《謝雪紅評傳》之貢獻與爭議〉，《台灣風物》第六十卷第二期。台北(2010)：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盧修一，《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台北(2006)：前衛出版社。
《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四冊)〈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台北(1989)：創造出版社。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1991)：前衛出版社。

【講義】

流亡、自治與民主：
試論陳芳明著作《謝雪紅評傳》之貢獻及其爭議¹

文／林 瓊 華²

這冊傳記的史實建構與論述方式，還有頗多可議之處，倘然有機會改寫的話，全書章節顯然有必要做大幅度的調整。——陳芳明，〈花謝落土又再回〉，《謝雪紅評傳》

（前衛版序，頁 32-1，1994；麥田版，頁 9，2009）

這本書絕版已久，不時有人追問再度問世的消息。經過將近半年的增補修訂……，使過去的一些錯誤糾正過來。

—— 陳芳明，〈縱身投入歷史漩渦〉，《謝雪紅評傳》
（麥田版（「全新增訂版」），頁 5，2009）

1 本文改寫自作者博士論文中的一節。兩位不具名審查委員，以及在修改過程中提供寶貴意見的友人，作者特別致謝。

2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與人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謝雪紅的名字之所以在台灣 1990 年代的社會重新出土，最主要是因為陳芳明歷時四年³所撰寫的《謝雪紅評傳》（以下簡稱《評傳》）於 1991 年 7 月 15 日在台灣的前衛出版社出版。第一刷出版後僅僅十天，隨即出版第二刷。1992 年 3 月第三刷；1994 年 4 月再版。十五年後，2009 年 3 月，陳芳明換了另一家出版社，又出了「全新增訂版」（封面語）。這本著作的出版過程本身，如陳芳明自己所言，可說是台灣後解嚴社會變化歷程的一個小縮影，也是作者陳芳明歷經思想轉變的過程。⁴然而台灣社會對謝雪紅這位重新返鄉的歷史人物的熱烈迴響，也正說明了自 1987 年解嚴以來，台灣社會對自身歷史重新「補課」的熱切渴盼；過去被政治所剝奪和掩蓋的本島史，民間社會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挖掘，乃至「建構」。其中陳芳明透過《評傳》所呈現的，對台灣歷史的貢獻與爭議，其重新再現謝雪紅的方式，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這本充滿作者個人評論與詮釋的傳記，在「後記」中非常清楚地解釋了自己的寫作動機：「選擇謝雪紅的政治生涯做為本書的主題，乃是為了建立長久以來我所企圖追求的台灣史觀。所謂台灣史觀，卑之無甚高論，只不過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建構台灣人的歷史解釋。」⁵由於台灣過去長期被殖民統治的歷史背景，作者認為在統治者的操控下，台灣人失去詮釋自己歷史的權利，「我要尋找謝雪紅的原型，主要是為了尋找台灣人的歷史原貌。」⁶而作者認為台灣歷史的建立，必須從「右翼意識形態、統治者的宰制心態、男性沙文主義、中華沙文主義」的枷鎖中自我釋放。⁷在這樣看似進步的創作動機下，作者運用了大量的史料，包括與相關人士的書信往來，以及部分口述訪談等。這本長達近八百頁的著作，甫出版未久，即在台灣社會捲起一股風潮，不僅使文化界各自以不同的創作方式呈顯謝雪紅的形象，⁸更重要的是促使楊克煌的女兒楊翠華女士，遠自美國赴中，

3 陳芳明，〈縱身投入歷史漩渦〉，《謝雪紅評傳》（以下簡稱《評傳》）（新版）序文（台北：麥田，2009），頁 3。

4 陳芳明，〈縱身投入歷史漩渦〉，《評傳》（新版），頁 3。

5 陳芳明，《評傳》（舊版）（台北：前衛，1991），頁 711。

6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712。

7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714。

8 從臨界點劇象錄劇團於 1994 年由導演田啓元編導，兩度演出以謝雪紅故事為背景的相關演出開始，此後黃玉珊、蔡秀女、郭珍弟等女性編導，以及李昂都會以電影劇本、紀錄片與小說形式來呈現謝雪紅的面貌。2008 年，國家文化總會也在副秘書長陳秀惠策畫的「台灣女性文化

將謝雪紅與其父的自傳、回憶錄手稿等一手史料帶回台灣出版。⁹

一本台灣歷史人物傳記能引起台灣社會如此高度矚目，並間接刺激了其他藝術家與作家、導演，乃至台灣女性團體的重視與創作，毋寧締造了台灣文化界罕見的紀錄。更重要的是這本著作本身，彷彿也像這場文化與政治運動的一部分，它不僅帶動了謝雪紅一手史料在台灣的出版，更因其本身在歷史問題詮釋上的爭議性，進一步也刺激了對岸中國一系列二二八事件之後，逃亡中國的左翼台灣人的自傳與回憶錄在台灣的出版，¹⁰最後更促使中共高層正視謝雪紅的問題，而有了新的政治定調——《啊！謝雪紅》於 2007 年的出版，正是出於對《評傳》的迴響。¹¹

這樣的影響力，毋寧是相當驚人的。即使這部作品在史料詮釋上充滿瑕疵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偏見，但都無法否認這本書出版以來，對謝雪紅歷史在台灣與中國重新被關注的貢獻。也正因這本著作的能量如此豐沛，對台灣文化界影響不小，在本書出版十八年後復推出新版的今天，作者陳芳明在序言中表示這本「全新增訂版」是「經過近半年的增補修訂」，由專人協助，「使過去的一些錯誤糾正過來」。¹²期待之餘，實值得吾人回到評論一本台灣歷史人物傳記作品的角度，給予客觀的評價。

二、《謝雪紅評傳》的寫作背景

地標」計劃中出版的《女人展痕》(二)一書中，將謝雪紅列入未來籌建地標的女性歷史人物之一。2010 年 5 月，台灣戲劇界又有汪其楫與王墨林合作推出舞台劇，由汪其楫演出謝雪紅一角。可見謝雪紅在台灣社會引起的反響，仍在持續中。

⁹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32-7、32-8；《評傳》(新版)，頁 5。

¹⁰ 這些作品多由台灣的統派作家陳映真所主持的人間出版社所出版。

¹¹ 參張克輝，《啊！謝雪紅》自序(台北：海峽出版社，2007)。在這篇序文中，張克輝很清楚地說明因自己與謝雪紅只見過一面，無甚淵源，但因在《謝雪紅評傳》中被陳芳明列為「反謝雪紅派」才開始注意陳芳明這本著作。從 1991 年至 2003 年間，台灣統派人士對謝雪紅被陳芳明塑造為台獨之母的作法極為不滿，並反應給當時任全國台聯會長與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的張克輝，使他壓力極大，後幾經輾轉，才由他本人執筆，以劇本形式完成這冊《啊！謝雪紅》。這冊劇本收錄謝雪紅在中共的政治整肅運動極為艱難時，抒發當時心情的若干詩文，可一窺謝氏晚年的心境。

¹² 底線為作者所加，旨在提醒《評傳》的老讀者們檢視這個說法的真實性。陳芳明，〈縱身投入歷史漩渦〉，頁 5。

誠如原是研究中國宋史的陳芳明自己所言，在 1974 年 9 月抵達美國華盛頓大學求學前，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中國沙文主義者」，¹³「是台灣教育體制下製成的最好標本。乾淨、純潔，不帶任何一隻左派的細菌，那就是三十歲以前的我。」¹⁴在台灣已出版了兩本文學評論集的他，由於赴美後接觸到大量過去在台灣被列為禁書的作品，接觸了被國民黨列為非法分子的台灣政治人物，¹⁵對陳芳明的政治思想與國家認同產生極大的影響。1978 年，陳芳明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護照被取消，此後至 1989 年才第一次返台。¹⁶1979 年冬天，台灣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許多異議分子被捕入獄。之後接連發生「林宅血案」，對當時島內外台灣知識分子產生劇烈的衝擊。1980 年，陳芳明放棄博士學位的攻讀，舉家南遷洛杉磯，投入「美麗島事件」後，流亡美國的政治人物許信良所創辦的《美麗島週報》，展開其政治運動生涯。

《評傳》最初連載於 1986 年底，陳芳明在美國主編的雜誌《台灣文化》，1990 年底開始在台灣的《自立晚報》刊載。這本寫作於陳芳明流亡期間所撰寫的歷史人物評傳，不僅是他從中國史研究轉向台灣史的第一本著作，誠如研究者所言，事實上也充滿了作者本人對謝雪紅人生的自我投射。¹⁷如同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在寫作《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後，曾表示：“Madame Bovary, c’ est moi!”（我就是包法利夫人！），謝雪紅之於陳芳明，也有類似的情境。不同的是，《包法利夫人》畢竟是一本文學小說，福樓拜有屬於小說文類的創作空間來形塑 Emma 這個女主角，且小說家本人曾表示對 Emma 的反感，但陳芳明對謝雪紅十分崇拜。當傳記作者對傳主投射過多的熱情，毋寧是相當危險的。而面對一位活生生的歷史人物，即使作者在題目上聲明該傳記為「評傳」，但於史料詮釋與應用上，仍無法隨作者主觀的個人意志任意發揮。

欲了解為何陳芳明在撰寫這本傳記的期間，對謝雪紅的自我投射或認同如此

13 陳芳明，〈涉渡——序林衡哲選集〉，《鞭傷之島》（台北：自立晚報，1989），頁 73。

14 陳芳明，〈向左偏一點點〉，《台灣日報》，1997 年 4 月 28 日。

15 如 George H. Kerr 的 *Formosa Betrayed*、《憤怒的台灣》、《台灣二月革命》、《毛澤東語錄》、中國的影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並認識了流亡海外的台獨人士彭明敏。1975 並加入了校園的「國際特赦組織」。陳明成，〈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29。

16 張富美，〈落土不凋雨夜花〉，《評傳》（舊版）序文，頁 39。但距赴美後到第一次返台，中間長達十六年。

17 許淑真，〈政治與傳記書寫——謝雪紅形象的變遷〉（台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0），頁 110-116。

強烈，也許透過當年作者在美國期間所遭逢的思想震盪與隨後的流亡經驗，可對此書的寫作背景有所理解。

出國前，長期浸淫在中國歷史與現代詩創作的陳芳明，在談及負笈美國期間，思想上受到的莫大震撼，是在華盛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中，接觸了有關二二八事件歷史等台灣禁書後而產生的。他從抗拒到接納，情感上波瀾起伏：「如果那些文字的記載都是真實的，我過去所學的歷史不都屬於欺罔？我開始抗拒，不願承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件，在我的土地上，豈能容許有過如此悲劇的釀造。……過了半生，我第一次以虧欠而熱切的心情注視台灣時，卻是站在異國土地的高峰。蒼茫迷霧的海洋，灰暗下降的雲層，使我找不到自己土地的方向。但是，台灣的形象卻以從來沒有過的清晰模樣出現在我心裡。在捨離青春、投向壯年的那個時刻，我迎接了二二八事件的第三十週年。撕裂的靈魂，以著劇痛，帶領我迎向生命的另一階段。」¹⁸

由於流亡所帶來的思鄉情緒之孤獨與悲切，被剝奪返鄉權利的陳芳明在一個訪談中曾生動地表示：「十三年前，台灣宣布戒嚴，我手持一本白皮書，國籍上印著 None，要飛往日本東京，那是留美後第一次回到遠東，在飛機上看到東方的屋瓦，不禁眼淚盈眶。想到同一個大陸板塊邊緣的台灣，想到台北的漢口街，拐個彎走到重慶南路，商務印書館對面是華南銀行，銀行後面巷子裡有親愛的家，你知道，那種思念可以細到就像真的在那條街上走路一樣。所以後來我又從日本飛香港，想更接近台灣，但是眼睜睜看著故鄉擦身而過，那真的是心如刀割，著陸後打電話回台灣，心情非常激動。」¹⁹

身為台灣 1970 年代的海外流亡者，漂泊多年，有家歸不得的陳芳明，透過投入政治運動的洗禮，其生命座標終於定位於台灣。如此流亡心境的曲折，完全投射在他這段期間所撰寫的《評傳》上。由於作者在政治思想與國家認同的巨大轉變，使得他與自己筆下的謝雪紅的生命經驗有了強烈的呼應：他們都是被強權所迫，不得不離開自己故鄉的流亡者。

由於陳芳明對謝雪紅選擇性的強烈認同，使得他投注大量情感建構這位女革命者形象的同時，也將自身當時的意識形態灌注在傳主身上。這一點，在更早期間，即有研究者從女性主義語藝批評的角度，²⁰認為陳芳明在該書中對謝雪紅的

18 陳芳明，〈五十年家園〉，《台灣文藝》第 159 期（1997 年 10 月）。引自許淑真，〈政治與傳記書寫——謝雪紅形象的變遷〉，頁 112。

19 魏可風，〈流亡，所以孤獨——專訪陳芳明的寫作之路〉，《自由時報》，2000 年 3 月 11 日。引自許淑真，前引書，頁 113。

20 賴治怡，〈女性主義語藝批評的實踐——閱讀「新台灣文庫」〉（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

「正面評價洶湧氾濫」，²¹對其性格的容忍，以及若謝有絲毫錯誤時的牽強解釋，實已剝奪謝雪紅作為「完全人」的可能，而將之置入「偉人」之階，成爲一種樣板人物，在語藝實踐的美學觀點上是失敗的。²²再加上作者主觀思維的投射強烈，²³也即在寫作手法上，作者過度詮釋乃至建構了傳主的主體思維，這種僭越性的書寫方式，形成作者自身之主體與傳主主體難分的狀態。²⁴也無怪乎被陳芳明在《評傳》後記中，尊之爲其台灣史啓蒙者的史明先生，²⁵會認爲陳芳明撰寫該書，不像一位歷史學者，而更近似一位文學家、文藝家。²⁶

三、政治語言與歷史書寫

然而，在面對有關這本傳記的批評時，陳芳明對具統派色彩的異議者，很難維持論學者就事論事的態度，也許這與批評者的論辯語言之尖銳也不無關係。但當歷史知識的主題被情緒性的政治語言取代，我們也就失去了進一步探索歷史真相的理性精神，這對擱淺已久的台灣史本身，毋寧是相當遺憾的。特別是謝雪紅這位歷史人物一生的政治行動所牽涉的國際左翼運動、國族認同問題，再加上今天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現實；放回長期缺乏左翼思想傳統與視野的台灣社會，其形象在政治脈絡上更顯曲折複雜。這也特殊地形成統獨兩派各有其執著認定的，統派的與獨派的謝雪紅——這個現象，毋寧相當程度反映出，儘管台灣解嚴迄今已超過二十多年，但由於轉型正義工作的遲滯，我們仍無力跳脫歷史與現實糾葛的迷障，只能繼續處於各執其是的無奈狀態中。

所，1993)。賴治怡在本研究中提出的女性主義視角的觀察，認爲陳芳明所形塑的謝雪紅，是一位被否定女性身分的女性，是「女的」英雄，而非「女英雄」的樣板形象，頁 50。

21 賴治怡，前引書，頁 63。

22 賴治怡，前引書，頁 62。

23 賴治怡在論文中引用《評傳》（舊版）多段文字，指出陳芳明就某些傳主事蹟與其深信謝氏的英雄性格特質爲根據，經由敘述邏輯的因果必然論達成命題的寫作方式，使謝雪紅的「人」的性格消失。賴治怡，前引書，頁 65-68。

24 此一觀點，上述研究者許淑真也提出相同的觀察，見許淑真，前引書，頁 115。譬如陳芳明大量地使用類似的句法：「對謝雪紅本人而言，她從來沒有想到……她更沒有預見到自己……謝雪紅總是以爲……」（《評傳》舊版，頁 353）由於作者並非傳主本人，這樣的撰寫方式已近文學手法。

25 《評傳》（舊版），頁 718。

26 史明先生訪談，2000 年 2 月 19 日，台北。

關於這點，我們從台灣史學術界到目前（2010）為止，尙未見到針對本書的正式嚴肅書評這點，²⁷亦可窺其端倪。這或也說明，在長期接受反共教育的台灣社會中，左翼史研究的不易；加上兩岸交流開放以來，對岸在現實中呈現吾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形象，幾乎注定了台灣左翼史位處台灣史研究的邊緣命運。²⁸也因此，面對陳芳明這本聚集龐大有關日治時代台共運動、共產國際運動，乃至二戰後中共對台政策演變，以及左翼台灣人在中共體制下的經歷等史料的長篇鉅著，確實不易提出適切的評論。另一方面，曾對本書提出嚴肅批判的學者，最初是以一種完全屬於「邊緣戰鬥」的方式發表在流傳小眾的同仁刊物上，一來因能見度與流傳度低，不易引起討論與重視，二來是即使這篇文章後來被收入專書中²⁹，但因這本小眾的左翼刊物與專書的作者與編者，在台灣的政治光譜上被歸為統派，在台灣統獨壁壘分明的社會氛圍中，很容易因此模糊討論內容的焦點。當政治語言過度滲入歷史知識的探究與討論中，則很難令原本已不易釐清的史實透過理性討論被呈現。相反地，讀者被召喚的將只是自身內在原有的政治認同情感與立場，對認識台灣歷史本身卻無甚助益。

這個情況，猶如陳芳明於《評傳》（舊版）再版序文中，對北京的老台灣人周青的批評，並不是針對對方指出的史實問題提出回應，而是直接將周青指為「為中共的對台政策效勞服務」，³⁰以政治語言來迴避歷史問題的討論。這種以統獨煙幕彈來模糊知識問題的方式，被犧牲的卻是歷史知識本身。相同地，反對陳芳

27 關於本書的批評文章，限於篇幅，此處無法一一列舉，但多數評論文章並非發表在歷史專業的期刊中。另有三本碩士論文曾部分提及陳芳明這本著作，並仔細加以評析，分別是前文引用的：賴治怡，〈女性主義語藝批評的實踐——閱讀「新台灣文庫」〉（1993）；許淑真，〈政治與傳記書寫——謝雪紅形象的變遷〉（2000）；陳明成，〈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2002）。

28 值得一提的是，張炎憲館長主持國史館期間（2000-2008），以及1999年開始運作的「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在有關白色恐怖時期的相關研究與出版方面，皆累積不少值得重視的成果。

29 到目前為止，批判本書最有力的是最初以筆名「鄭國棟」的杜繼平於2001年所發表的長文〈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本文以上中下三篇連續發表在一份小眾的同仁刊物《左翼》的第15、16與18期，但針對《評傳》的批評集中在最後一篇。該文後收錄於集中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文學論、後現代論與後殖民論的文集《反對言偽而辯》（許南村編，台北：人間，2002）。

30 《評傳》（舊版），頁32-34。

明論述的批評者以極其尖刻的用詞對陳進行人身攻擊時，³¹也很難期待對手能真正有所反省，願意正面聚焦在歷史問題的討論上。陳芳明與台灣著名的小說家，也是左統派文化人的陳映真，在《聯合文學》月刊歷時近兩年多有關台灣文學史詮釋的論戰，³²對絕大部分不熟悉馬克斯政治經濟學理論或後殖民理論的台灣讀者，很難理解馬克思主義者陳映真為什麼在討論台灣文學史與殖民史時，對台灣社會性質的定性非常在意，而陳映真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立場，卻是更容易被台灣讀者指認的政治身分。由於兩人統獨色彩鮮明，史觀迥異，這場一般被外界視為統獨立場的論戰，並沒有真正在台灣學界引起廣泛的重視與討論。

然而，正如陳芳明在該書 1994 年再版的序言中，即承認「這冊傳記的史實建構與論述方式，還有頗多可議之處，倘然有機會改寫的話，全書章節顯然有必要做大幅度的調整。」³³並表示，「這冊充滿缺陷的書」，因一再受到議論與引述，對他已形成莫大壓力，而各方的關切與批評，「可以說早已超過這本書所能負載的分量了」。³⁴由此可知，陳芳明對自己這冊著作所犯下的，不論在方法或論述上的錯誤並非毫無所悉。所以當他在 2009 年的「全新增訂版」序文中，表示過去的錯誤已糾正過來³⁵，但對照舊版，以及陳芳明在序文提及的，楊翠華女士編輯出版的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我們發現，2009 年的《評傳》新版只是參考謝氏自傳，在註解上部分增添資料而已，但是正文內原來引用史料的錯誤，則完全沒有更正，他自己所謂的「頗多可議之處」，也依然完全被保留下來。我們下文將再論。

四、有關《謝雪紅評傳》的兩大爭議焦點

31 杜繼平在上述引文中指出陳芳明在為學上違犯學術紀律，引述作者名字張冠李戴，指證歷歷（頁 256），這些原可述諸公評。然以情緒言詞將「台獨教條」與陳氏連結，稱其心態、行徑卑劣（頁 265），文末並以「史學敗類的醜行」、「言行相背，表裡不一，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等用詞指摘（頁 291），反而有損該文本立論的重要價值，使統獨趨向壁壘之態，被便宜行事者貼上政治標籤，原應釐清的問題焦點反而無法被真正重視。

32 關於這場論戰的分析，可參考黃敏原以台灣文學為研究場域所撰寫的，有關國族認同的集體記憶與詮釋衝突的博士論文第六章：*Mémoire collective et conflit d'interprétation sur l'identité nationale. Evolution des discours identitaires autour la littérature taïwanaise (1977-2007)*, Chapitre 6, Thèse en sociologie, Paris, EHESS, 2009.

33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32-1。

34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32-1。

35 陳芳明，《評傳》（新版），頁 5。

職是之故，本文主要針對陳芳明在這本流傳與影響廣大的台灣歷史人物評傳上，提出兩個角度的批評，一是基本史學方法的史料引用與詮釋問題；二是針對謝雪紅是否為台獨主義者的議論。前者的問題對後者影響相當大，尤其後者也是迄今為止引起較大爭議的重點之一，值得進一步仔細探究。

由於上述陳芳明當年強烈的台灣民族主義立場，他在《評傳》所犯的最大錯誤，即是刻意要將謝雪紅與中共的歷史關係切斷。不論是基於史學方法的史料引用與詮釋問題上，或出於其個人「為尋找台灣人歷史原貌」所偏執乃至不免誤解的左翼史觀，在這樣的寫作方式與意識形態偏見下，對比作者耗費十年心力所蒐集的資料，並以四年的時間所「建構」出的謝雪紅歷史，吾人實難以真正認識到，台灣第一代與國際運動連結的社會主義者的形貌與歷史，有遠較民族主義者更寬闊的時代視野。

以下僅從史料引證與詮釋上自相矛盾的問題援引兩例，³⁶作為評析作者偏執「為尋找台灣人歷史原貌」的動機下，所引發的爭議。

（一）史料引用與詮釋問題

首先，在原版的《評傳》第 90 頁中，關於台共成立大會的出席者問題。陳芳明引用《警察沿革誌》的史料，寫道：「出席者有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朝鮮共產主義者代表呂運亨，林木順、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謝雪紅共九名。」此處作者雖也援引《警察沿革誌》日文版原文第 590 頁寫著「九名」，事實上卻只寫了八個人的姓名。這位被陳芳明漏寫的人正是翁澤生。當時的翁澤生已是中共黨員，作者明知翁也出席了這場台共成立大會，卻在後文接著寫道：「至於已經加入中共的翁澤生，卻反而沒有參加大會。」³⁷並認為「中共在其黨史上能夠勇於誇稱，台共是在中共直接協助下建黨，只不過是因為有彭榮一人在建黨大會上出現。」³⁸陳芳明會犯這樣的錯誤，毋寧是十分離奇的。因早在同年（1991）1 月，台灣出版的《中國論壇》月刊 364 期，他即曾發表過一篇〈翁澤生的中共路線〉，³⁹在這篇有關翁澤生的文章中，陳芳明清楚記載翁出席了台共大會的事實。——早了半年先發表的資料是正確的，但針對同一段歷史，之後正

36 在陳芳明這冊長達數百頁的著作中，有關史料引用與詮釋的問題著實良多，本文難以一一列舉，此處僅舉較具代表性的兩例，用以說明其史學方法上的問題。

37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91。

38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90。

39 這篇文章之後被收錄在陳芳明 1998 年出版的著作《左翼台灣》中。

式出版《評傳》時所撰寫的卻是錯誤的。這個十足自相矛盾的明顯錯誤，在近十八年後的（2009）新版《評傳》中，依舊沒有更正過來。⁴⁰

再者，有關謝雪紅與中共關係的史實部分，雖然日後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的出版，證明了作者在《評傳》中的大半推論都是錯誤的，⁴¹但是回到他對史料的引述與詮釋的方式上，在有關謝雪紅是否為中共黨員，以及何時入黨這點，恐怕多少也源於作者本人在撰寫這本評傳期間，主觀上對中共的偏見與敵意而產生的誤判，以致於雖然史料俱足，卻產生了迥異於史料訊息的詮釋。

事實上，早年謝雪紅在上海時期，若無中共的「慧眼識英雌」，注意到在上海五卅運動中表現出色的謝雪紅，進而邀她進入上海大學就讀，之後更進一步推

40 《評傳》（新版），頁 62；有關台共出席大會的人數，謝雪紅在自傳中清楚寫出十人，多「謝玉鵬」一人。筆者曾在論文中指出陳芳明的這個錯誤，參林瓊華，〈女革命者謝雪紅的真理之旅〉，《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20 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台北：國史館，2002），頁 1166（註解 72）。

41 其實《評傳》（舊版）是台灣最早出版有關謝雪紅歷史的專著，當一手史料出土，對照下會有錯誤並不足為奇。問題在於作者於舊版序文中表示自知可議之處不少，並認為有機會改寫的話，全書章節有必要大幅調整；新版序文又稱經增補修訂，過去的錯誤已糾正。然對照新舊版本，卻不知究竟作者所謂已糾正的錯誤何在？實令人費解。此處從謝雪紅的國族認同問題，及與中共的關係而言，舉出幾個完全未更正的錯誤，最明顯的即是謝雪紅在自傳中指出，自己在 1925 年五卅運動於杭州參加遊行示威期間，曾以「謝飛英」名義向《浙江日報》清楚表明「收回台灣」的想法，並在之後的遊行文宣上加上這個口號（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編者印，1997），頁 168-169），但是在陳芳明新版的《評傳》中，仍認為當年的謝氏「看過中國的腐敗與落後，根本也不可能想到要主張中國收復台灣」（頁 358）；另 1919 年謝氏赴青島時期，即萌生對「祖國」（中國）的情感，並開始有了漢民族精神與階級鬥爭的思想，是她自認一生經歷的重要轉折時期，但在陳芳明新版《評傳》中，雖在註解上引用了謝氏自傳部分資料（同上，頁 123-125），卻對其再三提起「祖國」的情感隻字未提。（同上，頁 34-35，註 16）。另有關謝雪紅加入中共的時間，據其自傳記載，她是於 1925 年在中共黨員黃中美的引薦鼓勵下入黨，當時雖無入黨儀式，但謝雪紅自始至終皆認為自己是中共黨員（頁 174）；陳芳明的新版《評傳》中，則仍然認為她雖為中共推薦赴莫斯科，但其身分並不隸屬中共，也未加入中共（頁 45）。另外在謝氏自傳中，清楚記載她與林木順皆就讀莫斯科的「東方大學」（頁 183），陳芳明在新版《評傳》中仍未更改地「確信」林木順是蔣經國「中山大學」的同期同學（頁 46）。全書例子不勝枚舉。兩書相對照下，可發現陳芳明這冊新版《評傳》序文中所謂已糾正的錯誤，只是以增添注解的方式補註，但正文內容錯誤的部分則完全未更動。

薦她前往莫斯科受訓，也不會有日後這位台灣第一位女革命者的誕生。台共的創立，及其組織成員的背景與中共的歷史淵源，原是無須迴避的事實，因為這的確是台灣左翼史的一部分。但若爲了政治意識形態的緣故，刻意迴避這一點，而另加扭曲或違背史實地去強行作解，恐怕才是傷害了「台灣人的歷史原貌」。

例如陳芳明在呈現蔡孝乾 1946 年返台灣後，究竟有無與舊台共接觸，以及與謝雪紅當時的聯繫狀況上，就在史料詮釋上有矛盾的情況。在《評傳》中，作者先引用洪炎秋的回憶，認爲當時蔡孝乾潛返台灣，卻與舊識裝作不識，是蔡爲了秘密工作，不惜切斷舊有關係的證明。這位舊識，是蔡過去在中國求學時的友人，蔡不願在人際關係上橫生枝節而破壞地下黨工作，原是可以理解的。陳芳明在這一點有限的事實上，繼續推論寫道：「事實上，蔡孝乾不僅與舊友沒有聯繫，即使是台共同志也沒有掛鉤。蔡孝乾回到台灣之初，根本沒有與謝雪紅見面。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蔡孝乾才在林樑材的引導下與謝雪紅會面……。」⁴²這裡作者指出的林樑材，卻正是舊台共黨員，陳認爲蔡與台共同志沒有掛鉤的說法，明顯自相矛盾。接著是他的詮釋方式，也有太多基於個人主觀心理臆測的過度或失真的推論。他認爲蔡孝乾沒有及早與謝雪紅見面的原因，「是可以想像的」；⁴³陳芳明的「想像」是：「因爲，他是被謝雪紅開除台共黨籍的，他對自己 1928 年逃離台灣的事一直解釋不清。如果與謝雪紅見面，他就有必要把他潛逃的事交代清楚。恐怕是他心虛的緣故，所以就避開與謝雪紅碰頭。」⁴⁴

這樣的「想像」，根據最早對陳芳明這本著作提出挑戰的對岸老台灣人，也是被陳芳明歸爲「反謝派」而憤怒的周青，青年時期曾是台北人民協會的籌備委員，對陳芳明「以人劃線」的「封建、幫派觀點」非常不以爲然。⁴⁵針對這段歷史，他以自身經歷指出陳芳明的錯誤而反駁寫道：「（當時）謝雪紅爲了能夠早日取得與中共派來的地下代表接上關係，也透過我們這批人民協會籌備委員會到處尋找……」⁴⁶而有關蔡與謝兩人見面與否的問題，「都得由地下工作的特點與條件來決定，這是地下工作的一般常識」，⁴⁷而非由個人恩怨來斷定的。

在有關中共與謝雪紅的連聯上，透過蔡孝乾與謝雪紅的接觸，陳芳明引了兩

42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274；陳芳明，《評傳》（新版），頁 208。

43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274；陳芳明，《評傳》（新版），頁 208。

44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274；陳芳明，《評傳》（新版），頁 208。

45 周青，〈「歷史造像論」的實踐——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海峽評論》第 37 期（1994 年 1 月），頁 50。

46 周青，同上。

47 周青，同上。

則史料，一是二二八事件期間與謝關係密切的古瑞雲（周明）的回憶，⁴⁸另一則是一位匿名者 L 氏的訪談。⁴⁹陳芳明引述周明的回憶（請特別注意這份史料的出處）：⁵⁰「1946 年底蔡孝乾到台中找謝雪紅。當時謝要求恢復黨籍，並請求讓『人民協會』成員集體加入中共。蔡的回答是，中共黨章規定，只能個別入黨而不能集體入黨。至於謝個人，需填寫入黨申請書及經歷。謝拒絕了蔡的要求，她認為在白區留下有文字的證件太危險。從此以後謝自認為中共黨員，張志忠也把她當作中共黨員。」⁵¹另一位 L 氏說：「1946 年春天，蔡孝乾回到台灣建立地下黨組織，在此之前，1945 年 10 月上海地下黨就派過《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去過一趟台灣，和老台共應該有過接觸，詳細情形我不太清楚。不過據我所知，老台共沒有在那時候入黨的。謝雪紅也是到 1948 年才在香港正式入黨的。雪紅和孝乾在老台共時代就有分歧，這兩個人很難合作，這是大家都知道的。」⁵²

上述兩則資料並列後，陳芳明以非常肯定的語氣下了結論：「這樣就很清楚了。蔡孝乾回到台灣，並沒有與老台共銜接任何關係。具體來說，中共與謝雪紅完全沒有建立起直接的聯繫。」⁵³

針對引用的史料，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無疑是令人困惑的。因為在引述周明的說法中，蔡、謝二人明明已經見面了，蔡代表的正是中共來台建立地下黨的人，怎麼會有「中共與謝雪紅完全沒有建立起直接聯繫」這種結論？L 氏的說法中，則更沒有具體指出蔡、謝兩人沒有聯繫的訊息，雖他們早年即有分歧，但他說的是「這兩個人很難合作」，並無法得出作者上述斬釘截鐵的否定論。

或許也由於陳芳明沒有釐清當時戰後的危險情境下，謝雪紅與中共地下黨的「聯繫」與「入黨」之間的差異，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判斷錯誤。因為沒有「入黨」，並不表示謝雪紅與地下黨沒有關係，更不表示他們之間沒有聯繫。但是，這裡必須特別提出一點，在陳芳明上述引用的古瑞雲著作《台中的風雷——跟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頁 50-54 中，事實上古瑞雲多次清楚提到二二八事件期間，謝雪紅與中共地下黨重要成員張志忠曾有接觸。古瑞雲說，當時因台中處理二二八事件委員會二度成立，謝不願繼續與林獻堂等人周旋而不願加入，但後來為張志忠所

48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275。

49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276，註 37。

50 陳芳明這裡引述了古瑞雲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表示他曾閱讀過這本著作。

51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275，註 36。亦見古瑞雲，《台中的風雷》（台北：人間，1990），頁 34-35。

52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275-276。

53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 276。

說服。⁵⁴此處證明，謝雪紅不僅當時已有管道與中共地下黨聯繫，而且應該還早於與蔡孝乾的見面之前。⁵⁵

我們十分詫異的是，陳芳明既然引用了古瑞雲這份回憶史料，按理說應已知道古瑞雲清楚指陳當時謝雪紅與地下黨的聯繫狀況，卻仍舊下了完全背道而馳的結論。除非作者能證明古瑞雲這一段史料的真實性有待評估，但事實上如前所示，他也援引了同一份史料。這種基於作者個人主觀意志，選擇性地任意詮釋乃至「自行建構」歷史的撰史方式，實已犯了史家誠信之忌。

（二）謝雪紅的台獨主義者形象

解嚴以來，能在政治與文化場域的縱橫間，受到台灣不同政黨權力核心的重視與禮遇的台灣知識分子，並不多見。⁵⁶自陳芳明 1989 年返台，從民進黨文宣部主任（1992-1995）的職位離開後，開始在台灣中部的私立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大學任教，最後順利地回到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擔任中文系教授，並任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迄今，二十多年來，他的創作量驚人，從政治評論、文學評論、台灣史研究到個人散文集的出版，著作等身，發表場域遍及台灣各大報刊。他曾高舉與自許的左派立場、後殖民立場等，「儼然已形成倡言者位居台灣學術與文化界的『主流位置』，操作『邊緣理論』的特殊知識分子的形象。」⁵⁷然而隨著陳芳明不自限於政黨意識形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其過往透過《評傳》等作品所呈顯的「左翼史觀」，也受到不小的批判與質疑。⁵⁸特別是在謝雪紅一生歷史角色的定位問題上，因其偏重與導向台獨主義者的詮釋方向，在台灣長久以來因白色恐怖以降，缺乏左翼視野，又長期受到對岸中國恫嚇的社會現實氛圍中，復因謝雪紅反抗當權者的女革命者形象，在 1990 年代初期，台灣社會解嚴未久，回頭探尋台灣本土歷史浪潮的方興未艾中，加上婦女運動的勃興，透過陳芳明上述詮釋史料的方式，謝雪紅從一位社會主義者被建構為一名「台獨主義者」，對有著台灣認同意識的，本書的大部分台灣讀者而言，毋寧是相當具有煽動性與吸引力的。

54 古瑞雲，《台中的風雷》，頁 53-54。

55 林瓊華，〈女革命者謝雪紅的真理之旅〉，頁 1186-1187，註 139。

56 2008 年 3 月，台灣總統大選前，國民黨當時的候選人馬英九曾專程至政治大學拜訪陳芳明，令人印象深刻。

57 陳明成，〈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頁 224。

58 根據歷史學者王晴佳的說法，1990 年代之後，一般人已不再視陳芳明為左翼人士了。見王晴佳，〈當代台灣論述的雙重挑戰〉，《思想》第 2 期，《歷史與現實》（台北：聯經，2006），頁 97，註 5。

欲探究此問題，我們不免須回頭重新檢視 1928 年「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前的背景及該黨綱。1925 年 12 月，謝雪紅在上海大學四個月後，即被中共送往莫斯科的東方大學受訓。在這個由共產國際領導，幫助各國訓練共產黨幹部的大學中，謝雪紅與片山潛、德田秋一等日共領導者熟識，在面對日本殖民者的共產黨同志與接受共產國際的革命理論課程後，謝雪紅認識了「台灣殖民地社會」的特質，且當時共產國際通過布哈林的「日本決議案」，即日共 1927 年綱領，要求日共黨員須援助日本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日共於是成了台共的指導者與支援者。1928 年台共黨綱的撰寫，也正是在林木順與謝雪紅於 1927 年年底，參考日共與中共文件後，在日共渡邊政之輔等人的協助下所起草的。雖然這份政治綱領是台灣政治史上第一份有關「台灣民族獨立」的政治文件，但是若對當時共產國際的國際性質有所理解，就不會有陳芳明在《評傳》中一開始述及台共創建史時，即欲將「中共」與「台共」切割的意識先行立場。⁵⁹因為綜觀謝雪紅與台共成立之前的歷史背景，本就與中共密切相關；而台灣因是當時日本的殖民地，根據共產國際的日本決議案所訂的上述 1927 年日共綱領，日共本該協助自身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台灣民族獨立」在共產國際的理論視野下，是獨立於日本殖民之外，此不唯對台灣民族如此，對當時全世界其他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也是抱持相同的，須獨立於殖民政權外的民族獨立觀點的。

其次，日共與代表共產國際執行指導台共工作的中共，對台灣社會狀況的認識角度，與當時謝雪紅領導的台共不同，故運動路線也有差異，也因此產生政治路線判斷上的問題，但並非民族主義觀點上的意識形態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改革同盟」所撰寫的 1931 年台共綱領，在有關台灣民族獨立論與建立台灣民主共和國方面並沒有改變而清楚認識到，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獨立建國方向，是共產國際的革命目標之一。若強以今日中國與台灣的現實政治狀態投射到當年的歷史情境中，以今日政治意識形態去詮釋過去，不僅無法透過歷史反思今日的現實，反而成爲認識現實的阻礙。

謝雪紅在自傳中回憶初赴中國青島的過往，提及中國多處皆以「祖國」稱呼⁶⁰——事實上將中國視爲祖國，是日治時期不同政治派別的台灣人的共同心聲——乃至謝雪紅參加五卅運動時，在遊行中高呼「收回台灣」，⁶¹更是台灣歷史第

59 如本文之前所舉有關陳芳明在論及台共創黨大會的歷史一段，有關彭榮的中共代表出席上，對中共即持不以爲然的主觀負面評斷。

60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如頁 121、123、124、145、165 等多處。

61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頁 169。

一人公開喊出此口號的。一直到二二八事件之後，謝雪紅輾轉逃亡到香港，在她發表的公開信〈告台灣同胞書〉⁶²中，也依然稱中國為祖國，⁶³信末的口號是「台灣民主自治萬歲！全民族統一戰線萬歲！民主聯合政府萬歲！中華民族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⁶⁴

而究竟台共的民族獨立論，與歷經二二八事件之後，從海外與島內匯集出的台灣獨立訴求的不同何在？從上述 1928 年台共政治綱領上，有關〈臺灣共產黨與民族獨立運動〉一節，或許可得到解釋。該文開頭便是：「資產階級及其走狗雖然到處宣傳民族平等或民族自決權，其實不過是徹頭徹尾的弱小民族的口頭禪而已。共產黨必須揭破這個假面具。無論如何，民族獨立的要求只有在廢除階級的要求中才有意義。⁶⁵從歷史發展的情勢來看，民族獨立運動——也就是台灣獨立運動——是絕對不可能藉由和平手段或由漸進改良的途徑來達成的。特別明顯的是，想要依賴資產階級的領導是全然不可能的。……」⁶⁶

從上述這份由謝雪紅與林木順親自參與撰寫過程的台共創黨的政治綱領可知，對謝雪紅而言：「無論如何，民族獨立的要求只有在廢除階級的要求中才有意義」，清楚顯示她身為一名徹底的社會主義者對民族獨立問題的認識。這也才能合理解釋，為何戰後初期，陳儀政府尚未正式抵台前，她因誤以為楊逵與林獻堂、辜振甫、許丙等人準備成立的「台灣自治委員會」⁶⁷有牽連，她所籌備的人民協會因而攻擊楊逵參與台獨運動密謀一事。相同地，回想謝雪紅在香港時期，與廖文毅分道揚鑣的最重要原因，也正因對謝雪紅而言，廖文毅的「反蔣不反美」、「獨立託管派」主張，是「美帝國主義」拉攏少數親美分子，進行「台灣分離運動」，用以分裂中國民族統一戰線，對謝雪紅而言，這將使台灣成為美國的

62 謝雪紅，〈告台灣同胞書〉，《新台灣叢刊》第 2 輯《勝利割台灣》（香港：新台灣出版社，1947 年 11 月 1 日），頁 25-30。本文最早發表於 1947 年 8 月，新加坡的《南僑日報》，後轉載收錄於《勝利割台灣》。

63 謝雪紅，〈告台灣同胞書〉，頁 29。

64 謝雪紅，〈告台灣同胞書〉，頁 30。

65 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66 王乃信翻譯，《台灣社會運動史（三）：共產主義運動》（譯自：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台北：創造，1989）；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2006），頁 215-216。

67 這個由台灣三十多名仕紳與日本軍人當時準備成立的「台灣自治委員會」，欲囤積糧食、藏匿武器、破壞軍事設施，以便與美國及中國接受軍隊決戰。這場抗拒國民黨接收的獨立事件，因日本總督安藤不支持而告失敗。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台北：時報，1993），頁 267-269。

殖民地。⁶⁸上述史料，陳芳明在《評傳》中皆曾援引，⁶⁹由此可知，有這樣政治主張的謝雪紅，豈可能是一位贊成由資產階級與美國政治合作下的台獨主義者？

即使進入中國後，謝雪紅提出「台灣高度自治」、「台灣特殊論」，乃至楊克煌曾提出的「台灣是另一民族」的說法，這些發論從早期台共的政治文件，乃至二二八事件後在香港創立的《新台灣叢刊》中，皆可找到其理論來源。但回到當時中共發動政治整肅運動的背景來理解，就「台灣高度自治」而言，事實上，在台盟內部，謝雪紅並不是唯一提出的人，後來的台盟主席蔡子民也提出過同樣的說法。⁷⁰謝雪紅之所以被批判，是因「她的論調為台獨人士所好」，⁷¹但論調為台獨人士所好，並非表示她就是一位台獨主義者。所以當陳芳明認為謝雪紅整風期間受到的鬥爭，除了純粹來自台灣內部派系的圍剿外，就中共中央層面，是涉及政治主張的問題。中共在反右運動中，即開始對所謂的「地方主義者」開刀，不唯代表台灣地方主義者的謝雪紅，曾被周恩來譽為「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為中共在海南籌組人民軍，並立下顯赫戰功的海南島游擊隊總司令馮白駒，也在反右運動的1957年年底遭到整肅，直至1983年才得到平反。⁷²

中共在建國之後所掀起的政治運動，無可否認地，特別是反右與文革，對深懷祖國情感與社會主義理想的，身處中國的台灣人，是極大的傷害。特別是文革，有不少左翼台灣人在這段期間對中共的社會主義產生很大的懷疑。⁷³當然這可能也包括謝雪紅在內，但從對中共產生懷疑，到主張台灣獨立，畢竟還有一段不小的論證距離。由於缺乏直接史料證明謝雪紅的台獨主張，我們認為仍應從其階級革命者的角度去理解，歷經中共政治整肅風暴後的台灣人謝雪紅，會如何看待故鄉的未來。

根據筆者訪談多位在中國的老左翼台灣人，他們對謝雪紅的理解與情感或有不同，但皆肯定其人生的主調是一名社會主義者。而迄今為止，直接面對謝雪紅

68 林瓊華，〈女革命者謝雪紅的真理之旅〉，頁1208；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頁229-233。

69 陳芳明，〈評傳〉（舊版），頁266-267。

70 施瑋整理，〈台灣人在大陸的政黨——訪蔡子民先生談台盟〉，《海峽評論》第4期，1991年4月，頁105。

71 施瑋整理，〈台灣人在大陸的政黨——訪蔡子民先生談台盟〉，頁105。

72 朱國健，〈廣東為何「反地方主義」〉，《朱國健文集》（獨立中文筆會，2002年11月）。

http://boxun.com/hero/zhujianguo/2_1.shtml.novembre（2010,03,06）有關謝雪紅在中共體系下對「台灣特殊性」的主張，因涉及當時中共內部政策，筆者將再另文討論。

73 例如老台共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葉芸芸，〈故鄉的孩子〉，《餘生猶懷一寸心》（台北：印刻，2006）。文章中的受訪台灣人如王彪、林木，頁215-219。

的統獨問題，並提出迥異他人看法的，是謝雪紅生前的秘書古瑞雲。由於陳芳明所撰寫的《評傳》，有大量資料是由當年曾赴美開會的古瑞雲提供，⁷⁴也許我們可從古瑞雲所透露的，有關謝雪紅政治主張的訊息，間接理解何以陳芳明會如此建構謝雪紅的台獨主義者形象，雖然即使古瑞雲本人也並不同意陳芳明將謝雪紅建構為「台獨之母」的寫作方式。⁷⁵

在古瑞雲留下的手稿中，這篇題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小文章，呈現了古瑞雲對謝雪紅的理解：

一切從台灣人民的利益出發，這是謝雪紅的理念。這個理念越到晚年越堅定越明顯。早期主張獨立，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被國民黨占領之後，她主張民主自治。國民黨即將崩潰，中共正準備攻打台灣時，她當著饒漱石拍案，怒吼，堅決反對外省人（粟裕）任台灣省主席。

她之所以不主張獨立，其理由有三：

一，台灣歸還中國即（既）成事實情況下，台灣人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打倒國民黨的，而必須倚靠共產黨。

二，即（既）然要依靠共產黨就不能主張獨立，而只能實行自治，要「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三，在日本右派、美國虎視眈眈，覬覦台灣寶島的時候，一旦獨立與中共對立就有成為美、日附庸的危險，不能實現社會主義。

她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然而越到晚年越看得清楚——中共實行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不能把它搬到台灣。

走到最後，她沒有找到最理想的方式，而只能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即（既）不是日、美、蔣的，也不是中共的。

中共批判她「分離主義」、「地方主義」並無冤枉之處。

她能不能接受鄧、江的「維持現狀」、「高度自治」呢？顯然不可能。維持現狀的高度自治，即意味著讓代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繼續維持其一黨專政，並把它固定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她的唯一選擇只有依靠台灣人民自己的力量、極大的代價取得不附庸於日、美的台灣獨立了。獨立之後，從台灣人民利益（國防上，經濟上）出發，

74 古瑞雲先生訪談，2001年6月11-15日，上海腫瘤醫院。據古瑞雲表示，1980年代他到美國參加同鄉會，陳芳明曾留下他大量的口述錄音。

75 古瑞雲先生訪談，2001年6月11-15日。

與中共維持睦鄰關係。

閱讀古瑞雲這篇小文章，必須注意幾點的是，反右運動後，古瑞雲與其他被劃為謝派的台灣人，即不曾再見過謝雪紅，⁷⁶所以這個看法，可以視為古瑞雲個人推測與理解謝雪紅的想法，或是其個人對台灣前途的看法，而無法證明謝雪紅確做此想。另一方面，台灣在國民黨領政下，冷戰期間被劃入美國反共陣營，迄今依然是美日安全體系下的一員，謝雪紅當年之所以與廖文毅分道揚鑣的理由在此，這是她身為社會主義者的堅持；即使她認為中共實施的並非社會主義，但是依然無法贊成背後由美國掌控影響的台灣獨立。

有了以上認識後，我們或許可以清楚，這位一生對台灣與社會主義念茲在茲的女革命者，在政治道途中所走過的曲折與掙扎。然而，最重要的是，不論謝雪紅是否真正在晚年成為一位「只能隱忍在心中」的，盼望台灣人民依靠自己努力，勇於付出極大代價來爭取「不附庸於美、日」的台獨主張者，或是仍認為台灣的社會主義道路須以中共領導為前瞻，那都是一位生存與成長於台灣殖民時期的左翼歷史人物，以全部生命對其政治信仰與時代所做出的判斷與回應。台灣在謝雪紅的時代所面對的國際形勢與處境，乃至中國與台灣社會內部本身的政經變化，不論主客觀條件，都與今日我們所處的二十一世紀有極大的改變，這個時代的台灣人，也有屬於自身對所處的時代所做出的判斷與回應，謝雪紅不論統獨的主張，容或值得今日的台灣人乃至中國人反省思索，卻不一定有跟隨的必要，畢竟台灣不是過去的台灣，中國也非昔日的中國了。

但從「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個中共體制下，各民主黨派中唯一以地域性「台灣」名稱成立的台灣人組織名稱可知，即使在「自治」、「統一」與「獨立」的政治目標上，各方詮釋謝雪紅的政治思想迥異，甚至「自治」一詞也曾於1949年，被其他台灣人認為已處於中共體制下，不需特別強調了，⁷⁷但謝雪紅始終堅持，她甚至曾提出設自治憲法、省長、縣市長、鄉鎮長民選的方案，⁷⁸希望落實台人治台的自治理想。這一點與戰後左翼台灣人當年所思考的，對自詡代表「正統」的中國政黨（不論國民黨或中共）與台灣未來的關係有關。⁷⁹但當年多數的左翼

76 例如也被視為謝雪紅派的張硯女士。

77 葉紀東，《海峽兩岸皆我祖鄉》（台北：人間，2000），頁116；根據古瑞雲手稿〈台盟座談〉（未刊稿）記載，1950年，在一場台盟座談會中，台灣人王天強也曾認為在中共已取得勝利，打倒國民黨的情況下，自治是可以取消的。

78 古瑞雲手稿（未刊稿）。

79 參林瓊華，〈女革命者謝雪紅的真理之旅〉，頁1200-1204。

台灣人與謝雪紅自身，對台盟的「民主」二字，卻從無異議。「民主」一詞在中共體制下，並不是一個進步的政治理念，但回顧謝雪紅及其台灣左翼同志遠離故鄉、流亡中國的過去，檢視台灣社會的今日，即使「民主」一詞的內涵，隨著時代更迭在政治實踐上有所差異，但它畢竟是人類社會迄今所能相對接受的一種政治制度，或生活方式；它也連結了謝雪紅那個時代以降，到今天台灣社會多數人珍惜的共同價值。事實上，台灣今日的發展，已遠比謝雪紅及其主張自治、期待民主政治的世代，更具體實現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所無法達成的民主成就——台灣戰後的流亡者，曾在盼望歸鄉，與真正回到自己土地的歲月中，對此成就做出貢獻。而這恐怕也是今天中國流亡海外的有識之士，對中國政治的明天最大的盼望。我們或可說，謝雪紅當年與台灣左翼同志所揭舉的，人類追求公義與平等的價值理想，及其歷經挫折的流離磨難所呈顯的意義，時至今日對兩岸仍應有所啓示。

五、結語

陳芳明在 1994 年所說過的，「這冊傳記的史實建構與論述方式，還有頗多可議之處，倘然有機會改寫的話，全書章節顯然有必要做大幅度的調整。」可惜的是，多年來寫作與出版量豐沛的他，似乎在這十多年來的忙碌中，一直未能找到有關該書「適當的改寫機會」，以致於 2009 年更換出版社，重新推出本書號稱的「全新增訂版」時，雖表示經過近半年的增補修訂，過去的一些錯誤已得糾正，事實上原有的錯誤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台灣史學界對這本影響力不小卻問題重重的台灣歷史人物傳記的沉默，除了透露左翼史在台灣史研究領域確屬邊緣外，其與現實所牽涉的統獨意識形態問題之密切，而使得歷史知識退卻到第二位的事實，似乎也值得有識者共同自我期勉，台灣的歷史原貌的探索，特別是左翼人物的歷史，無須對中國元素有所隱諱或失之譏評，反而應正面理性地面對與接納確曾發生的過去，如此，或才能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真正尋找到一個在殖民年代下充滿血淚，摯愛台灣卻終生流亡中國，對社會主義執著而困頓，但卻誠實無欺的，堂堂正正的台灣人歷史原貌。而當左翼史能在台灣複雜的政治歷史與現實中被如其所是地解讀時，長期囿於右翼與反共意識形態的台灣社會，或才能真正辨識出謝雪紅作為台灣第一位女革命者的政治價值，並將其精神與生命視野，涵納為台灣思想財富的一部分。